

政治隐喻和文本矛盾:重读《芭巴拉少校》

赵国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萧伯纳的代表作《芭巴拉少校》具有高度政治隐喻性质,它暗中回答了19世纪以来马修·阿诺德等文人和学者热衷于探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未来的英国由谁来统治?安德谢夫家族企业的继承人问题,本质上是未来英国统治阶级的人选问题。作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安德谢夫无往而不胜,各个方面取得了成功。然而,令他(萧伯纳)始料未及的是,他所选中的库森斯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因为,历代安德谢夫所秉持的传统足以表明,像库森斯这种中产阶级出身、缺少“狼性”的人文知识分子是无法承担起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的,19世纪末以来的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此而言,可以说,萧伯纳在无意中写出了英国资本主义当时暗含的重大危机:工业精神的衰落。

关键词:政治隐喻;工业主义;工业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8)06-0012-07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18.06.002

Political Allegory and Textual Contradiction: A Revisit to *Major Barbara*

ZHAO Guo-xin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George Bernard Shaw's representative play *Major Barbara* is in essence a comedy of political allegory, for it tacitly tackles and answers the question vehemently discussed by a series of men of letters and cultural critics including Matthew Arnold from the 19th century onwards: who shall inherit England? The problem of finding the qualified inheritor for the Undershafes is in actuality that of choosing the best candidates for the future ruling clas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industrial capitalist class, the powerful Andrew Undershaft achieves overwhelming victories in almost every social aspect, but beyond his (Shaw's) expectation, the choice of Cusins, a professor of Greek and his future son-in-law, as his successor, is doomed to be a failed decision: unlike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of the Undershafes, Cusins is not a founding in any real sense, but a humanist intellectual born into a middle class background, and has never experienced social sufferings, thus lacking the hungry spirit or aggressiveness, which is fundamental to the prosperity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this sense, he is not a qualified successor of Andrew Undershaft and will inevitably fail to carry out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English industrial capitalists, just as the histori-

收稿日期:2018-06-23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专项资金项目(2017QZ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史”(12JYC752047)

作者简介:赵国新,男,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及英国文学研究。

cal development of English industrial capitalism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has already demonstrated. Thu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George Bernard Shaw unconsciously reveals the serious crisis latent in English capitalism of that time: the gradual decline of industrial spirit.

Key words: political allegory; industrialism; industrial capitalism

引言

自从17世纪所谓“光荣革命”以后,英国一直处于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联手共治的状态,前者主导国家政治,后者屈为经济附庸,直到1832年议会通过《改良法案》,土地贵族的影响日渐式微,资产阶级才开始真正执掌政权。随着工业革命的高歌猛进,资产阶级执政的弊端也日渐彰显,残酷的经济剥削、严重的贫富分化,举国上下交相争利,市侩风气盛行,凡此种种,让资产阶级的统治饱受非议,甚至遭到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双面夹击,那么,未来哪一个阶级更适合统治英国?正如列昂奈尔·特里林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查尔斯·狄更斯这样的小说家,还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化批评家,都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还专门著书探讨这一问题^[1]。

在19世纪60年代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一书中,阿诺德分析了英国社会各阶级的特性,给出了一个颇具人文主义色彩的答案。在阿诺德看来,自18世纪以降,英国贵族阶级逐渐失去了前辈的诸多美德,他们无心在文化和思想上下功夫,从而变得游手好闲,耽于逸乐,他们不但失去了道德的感召力,也丧失了治国理政的能力;而社会的中流砥柱——资产阶级——深受福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熏陶,胸无大志,唯利是图,市侩作风十足,对于文化和知识毫无兴趣;至于平民阶级,虽然不乏良善,但总体上粗鲁无文,他们的种种表现,无异于群氓。因此,这三个阶级均无法担负起领导当时英国的重任。阿诺德把希望寄托在文学知识分子的身上。在他看来,这些人虽然来自贵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但他们能够摆脱自己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充满人性,胸藏良知,拥有超越阶级利益的理性,热衷于人性的完善,致力于社会的进步;他们能以教育、诗歌以及文学批评为手段,教化世人,激发性理,唤醒良知,进而去左右未来的英国社会走向。

其实,在马修·阿诺德等人之后,还有一位文学大家也有意或无意地回应了这个问题,他的答案与阿诺德的对策高度雷同,此人便是萧伯纳。这一点是以往的研究者们没有注意到的。在《芭巴拉少校》这部政治喜剧中,萧伯纳讽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无能,批评了底层阶级的麻木不仁、安于贫困,忧心于工业资产阶级的无往不胜,最后,他安排希腊文教教授库森斯(典型的人文知识分子)成为大军火商安德谢夫(工业资本主义的象征)的事业继承人,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萧伯纳在这个问题上与阿诺德声气相通、遥相呼应,虽然他本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一、思想主题与内在矛盾

《芭巴拉少校》是萧伯纳在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也是他倾心打造的产物,他从1905年3月一直写到9月^[2]。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萧伯纳最有原创性、也是最出色的剧作^[3]。在问世20年后,温斯顿·丘吉尔依然盛赞不已:“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最精彩的20年后,在《芭巴拉少校》中,没有一个人物需要重新刻画,没有哪一句话、没有哪一条见解落伍过时”,他甚至认为,该剧堪称“现代文学的顶峰”^{[4]95}。一位政治保守派如此推崇这部批判现实的喜剧,个中缘由可堪玩味,恐非艺术价值之一端使然;丘吉尔之所以心仪此剧、为之击节赞叹,很可能与剧中流露出的政治悲观主义有关;当时在英国正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性,所有改变现状的努力只能带来令人绝望的结果。

熟悉萧伯纳戏剧的人都知道,他从来不写波澜壮阔、意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题材,他的作品“以描写具体的社会问题为主,例如医生、父母和儿女、婚姻、宗教迫害”^{[5]142}。《芭巴拉少校》也不例外,它和萧伯纳的另外两部名作《鳏夫的房产》和《华伦夫人的职业》一样,探讨的都是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令人厌恶的三种职业,但是,《芭巴拉少校》戛戛独造之处在于:后两者将贫困现象归咎于社会,它则强烈暗示,穷人也是有过失的,因为他们太能忍受贫困了^{[4]92-93}。无论贫困是社会造成的,还是个人造成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罪恶,这是萧伯纳在剧中力求表现的主题,对此,剧本的《前言》中已有明确交代。不过,“贫困即罪恶”这种说法倒不是萧伯纳的原创,而是来自他所崇拜的小说家塞缪尔·巴特勒。基督教圣徒保罗曾说过一句名言:“热爱金钱是万恶之源”,巴特勒反其意而为之,将其改为“没钱才是万恶之源”^{[4]90}。

与大多数内容轻松愉快、结局皆大欢喜的喜剧不同,《芭巴拉少校》的结尾充满了幻灭和忧伤,这是萧伯纳喜剧的一个特色,表现出作者对未来的绝望:资本主义制度无孔不入,极具腐蚀性,甚至能够把慈善事业变成邪恶势力^{[6]15},救世军就是典型的例子,它打着慈善的幌子维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成为防止底层革命的社会解压阀。这就是资本势力的可怕之处,它可以把任何阶层的人驯化得俯首帖耳,彻底丧失反抗意志,从而让“世人皆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成员”^{[5]141}。

以上所述,并非精深见解,稍做思考不难得出。如果在细读此剧的同时,再联系起萧伯纳时代的社会语境和其他相关文本,我们就会发现,《芭巴拉少校》也是一部政治隐喻剧,它暗中预设和回答了19世纪以来英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热衷于探讨的那个重大问题:未来的英国应该由谁来统治?安德谢夫军工厂的继承人问题,实质上就是英国未来统治阶级的人选问题。

萧伯纳以讽刺、幽默的笔法表现了以薄丽托玛夫人为代表的没落贵族阶级的偏狭无能,以窝克为代表的贫困无产者的麻木、顺从,以安德谢夫为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睥睨一切,能够改变他人的信仰,根据自己的意愿,找到合格的接班人,继续掌控政权。这种政治隐喻性质还体现在,在安德谢夫军工厂的管理方式与大英帝国的治理策略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安德谢夫利用悬殊的阶梯工资和工头制,制造出一个层次分明的等级体系,将雇员与资本家的矛盾转移到劳动者内部,让他们互相猜忌、彼此不和,从而坐收渔人之利:“师傅们对学徒就摆架子,呼来喝去;开车的就瞧不起扫地的;技术工人就看不起壮工;工头是连技术工人和壮工一道整,一道欺侮;助理工程师挑工头的毛病;总工程师又让助理工程师日子不好过;车间主任整工头;职员们呢,到星期天就戴上礼帽,拿着赞美诗的经本,绝不和任何人平等往来,好保持他们的社会优越感,结果是庞大的利润,最后都落在我手里”^{[7]283-85}。这种挑拨分化的策略既是大英帝国在国内进行社会治理的常用手法,也是它统治海外殖民地的惯用招数,它与“均势外交”一样,成为当时的基本国策。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拉尔夫·福克斯在《大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策略》一书描述的那样,英国殖民者总是在不同教派、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之间,制造差异,挑拨离间,鼓动冲突,从而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成功地转移到被殖民者内部,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8]。

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安德谢夫力排众议,征服了所有对手,找到了理想的人选,对于安德谢夫全家而言,这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既没有违背家族传统,也没有让遗产外流。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和绝大多数观众(读者)而言,无良资本家获胜的结局是令人忧伤的,因为它预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会长天地久,无产者翻身无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萧伯纳本人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悲观态度。然而,令安德谢夫和萧伯纳始料未及的是,像库森斯这样的人选,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作为标准的人文知识分子,库森斯有的是哲思,缺的是“狼性”——白手起家的资本家所具有的那种奋发有为、利润至上的工业主义精神——安德谢夫军工厂三百年来之所以财运不辍,依靠的就是历代厂主身上的这种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精神,这也正是它一直选择社会弃儿作为接班人的原因。这样一来,文本内部就出现了矛盾,貌似无往而不胜的安德谢夫,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实际上是失败

者,因为,安德谢夫军工厂遴选接班人的传统足以说明,像库森斯这样的人文知识分子是无法承担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的,19世纪末以来的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就此而言,萧伯纳在无意中写出了英国资本主义当时就已经暗含的、后来逐步得到印证的重大危机:工业精神的衰落。

二、贵族阶级的没落

一如亨利·菲尔丁、查尔斯·狄更斯等前辈,萧伯纳也喜欢使用“特殊命名法”,让他笔下人物的名字暗含寓意、深藏褒贬。薄丽托玛(Britomart)夫人的名字就带有强烈的影射和讽刺意味。一般认为,它来自斯宾塞的史诗《仙后》,这位神话人物是英格兰的伟大母亲,萧伯纳用它来代表英国,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薄丽托玛夫人的言谈举止具有英国最有代表性的社会群体——贵族阶级——的典型特征。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名字和它的内涵。这个名字相当于 Brit、to 和 mart 这三个词的合写,字面意义为“走向市场(化)的英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萧伯纳用它来暗指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独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土地贵族的市场化,也就是说,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互相渗透,形成了稳固的政治联盟,就剧情而言,薄丽托玛夫人与安德谢夫的婚姻就是这一历史过程具体而微的体现。

在第一幕当中,薄丽托玛夫人向儿子抱怨:“怎么,你总不能以为你外公还有钱给我吧?我们斯蒂文乃支家族也不能对你有求必应啊。安德鲁也得做点贡献吧。照我看,他在这笔交易当中一点也没有吃亏”^{[7]35}。这位精明的当事人心里很清楚,他们的这场婚姻就是贵族世家的门第和资产阶级的财势的对等交易;而她之所以降尊纡贵、甘心下嫁自己内心鄙夷的资产阶级,无关于感情上的依恋,而是家道衰微所致,正如她对儿子所说的那样:“你很清楚我父亲多么穷;他现在一年的收入将将才七千镑;说实话,要不是他还有斯蒂文乃支伯爵的头衔,他连社交活动也没法参加了”^{[7]17}。斯蒂文乃支家族的没落,是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贵族阶级失势的缩影;他们不但失去了政治统治权,还失去了经济支配地位,繁华已去,内囊渐空,只好依靠空洞无物的门第意识为自己撑腰打气。

长子斯蒂文是才能平庸的青年贵胄,既无作恶之能,也无行善之心。在强势母亲的管教之下,性格有些懦弱,缺乏主见,对于自己的前程,心里一片茫然,毫无规划。此人多少带有厌世情绪,对什么职业都不太上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无论在能力上,还是在气质上,他都与文艺无缘,对于哲学,也没有一试身手的野心,从事律师行业,又感觉太庸俗,当然,他也不屑于当演员^{[7]267}。正如多数贵族子弟那样,他极度鄙视工商业,对于军火生意更是深恶痛绝^{[7]265},虽说他母亲一再撺掇他子承父业,但他向安德谢夫表白:他对工商业既无才能,也没有兴趣,他打算走当时大多数贵胄子弟的必由之路:从政^{[7]261}。结果遭到了安德谢夫的鄙夷:“他(斯蒂文)自己选择的职业恰如其分。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又认为他什么都知道,这显然是干政治的好材料,推荐他给某位大人物去当私人秘书,只要这位大人物能保他当上个次长,你就再也不必为他操心了。他最后一定能自自然然、稳稳当当地当上财政部长”^{[7]271}。这段对话中,安德谢夫一方面批评贵族政客不了解社会实务,无能透顶;另一方面,他对贵族政治的裙带关系现象也表现出厌恶之情。安德谢夫毕竟是在资产阶级自助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他真正欣赏的是那种个体主义的自我奋斗精神。正因为缺乏这种白手起家的精神和必要的社会历练,斯蒂文不可能成为合格的继承人:“他可能学会写字间的那套理性公事,可还是不懂怎么办企业,就像那些家族的儿子一样。企业呢,开头就靠老习惯维持着,直到有一天,真正的安德谢夫出世了——多半是个德国人,或是意大利人——发明一套新办法,就把他挤垮了呗”^{[7]253}。

“芭巴拉”这个名字来自中世纪传说中的著名圣徒,她的故事有两个版本,内容大致相同:一位名叫芭巴拉的年轻美女,生长在一个信奉异教的富人家庭。她父亲外出之前,将她禁锢在家中,不许交接

外人,但在此期间,她却偷偷地信奉上了基督教。她父亲回家后,发现了这一秘密,劝她放弃信仰,回归异教,但她坚决不同意。她父亲一怒之下,就砍了她的头。但她父亲最终遭到天谴,被雷电劈死^{[9]136}。

芭巴拉少校也是出身富室的美女,她的父亲安德谢夫信奉“金钱教”。当安德谢夫不在家期间,她开始信奉基督教中的福音派,安德谢夫回家后,发现她有了新的信仰,就试图让她改信“金钱教”,只不过他并没有用砍头的办法,而是采取了“诛心”之策——金钱收买^{[9]137},他不但没有遭到天谴,反而大获全胜:他既成功地让女儿皈依了自己笃信的“宗教”,又在家族内部找到了继承人。萧伯纳把悲惨的圣徒传说应用于现代,赋予它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让经济因素战胜了宗教因素^{[9]138}。

芭巴拉出身于富裕的贵族资产阶级家庭,但心中充满了宗教理想主义,她一心想改良社会,扶危救困,拯救世人的灵魂,但是她对经济和政治现实了解不多,也不够深刻^{[10]38}。从老密和势利眼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她对救世军本质的认识,她对阶级社会的了解,远远不如这两位接受她救助的下层人士^{[10]40}。在强大的资本势力面前,这位贵族理想主义者,除了低头认输之外,别无出路:“弃绝安德谢夫和包杰就是弃绝生活”^{[7]371-373}。

三、不合格的接班人

库森斯这个人物的名字是经过作者悉心设计的^{[10]38}。他的全名是 Adolphus Cusins,“Adolphus”意为“高贵的狼”;“Cusins”源自 cousin(表兄弟)一词,在剧中有戏谑之意。为了继承安德谢夫的军工厂,他向众人透露一个大秘密:他本人是私生子,因为他母亲是他父亲已故妻子的妹妹,这个婚姻在英国本土是不合法的,因此,薄丽托玛夫人讽刺说,他使自己成为自己的表弟。萧伯纳是这样介绍他的:这位年轻的学者,“身体瘦弱,头发稀疏,有幽默感,但更有书卷气,也更含蓄,其中夹杂着暴躁的脾气。他一生都被这两种倾向所折磨。一方面,他生性善良,有高尚的道德心;另一方面却有不近人情嘲弄人的冲动和烟熏火燎的急躁劲儿”^{[7]43}。显而易见,“生性善良,有高尚的道德心”属于反话正说,是对这位机会主义者的反讽,这一点不难看出。但他的后一种性格倾向——“不近人情嘲弄人的冲动和烟熏火燎的急躁劲儿”——就有些让人费解,需要仔细分析文本中的一些暗示,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做出比较合理的推测。这种焦躁的性格倾向透露出,他心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这种焦虑很可能与他的出身有关。按照剧中交代,他父母是英国人,后来移民澳大利亚,他在那里出生、长大、受教育。在当时的英国人眼中,澳洲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流放到那里的英国人永远不得回国,回国即是死路一条,正如狄更斯小说《远大前程》中的马格维奇,萨义德曾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分析过这种微妙的情感结构^[11],因此,在英国本土人士看来,澳洲的英国人是二等公民,身在伦敦的库森斯对此心知肚明。而他此时又急于跻身上层社会,这种出身让他无法释怀,为之惴惴不安,焦虑之感,油然而生。他之所以追求芭巴拉,固然有情爱的因素,也不排除他心怀借此晋身的动机。库森斯自称“宗教的收集者”,说自己信奉所有的宗教,萧伯纳以此来暗示,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他之所以加入救世军,就是为了追求芭巴拉。他之所以能得到薄丽托玛夫人的接受,这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象征资本——希腊文教授身份;用薄丽托玛夫人的话说,“说到底,谁也不能看不起希腊文”^{[7]15}。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欧社会,一直自居为希腊-罗马文化的嫡派子孙。在19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对古希腊文化推崇备至,近乎病态。为统治阶级培养后备力量的牛津和剑桥,重视古典语言的程度远远超过母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是常设课程,而英国语言文学直到19世末才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崇拜希腊文化本质上是膜拜上层阶级文化,精通希腊文化有光大门楣和强化阶级区隔的功效,而这正是薄丽托玛夫人之类的没落贵族为了自我证明而急需的东西。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库森斯能否成为工业资产阶级合格的接班人?对于这个问题,剧中没有直接回答,但是,根据剧末所描述的库森斯的无比欢快的种种畅想,我们可以感受到,萧伯纳默认他是合

格的接班人,这符合萧伯纳喜剧的特点:它们总有一个令人忧伤的结尾。不过,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安德谢夫和薄丽托玛夫人先前的一段对话,我们就会发现,库森斯其实并不是合适的继承人,安德谢夫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指定他当接班人的:

我要的是一个既没有社会关系,也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他不是个强人,他就根本不可能参加竞争。可是这样的人我一个也找不到,现在的那些私生子,刚生下来就叫慈善机构、教育当局、监护人协会之类的组织抢走了;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才能,那些中小学校长就要抓住不放,然后就要像训练赛马似的训练他去赢得奖学金;往他们脑子里灌输各种二手货的思想;用纪律和反复的操练叫他们温顺,叫他们文雅;结果这些孩子都成了精神上的残废,最后只能去教书。你要是真想让兵工厂不脱离我们的家族,那你最好找一个符合条件的私生子,叫芭巴拉嫁给他^{[7]259}。

由此可见,安德谢夫之所以选中库森斯,完全是出于不得已,一方面,他面临着妻子的压力,肥水不落外人田;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化,让他找不到货真价实的私生子,因此,他只是在形式上遵守了安德谢夫家族所崇尚的工业主义传统,实际上却严重违背了这个传统。

名扬欧洲的安德谢夫军工厂创始于英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原本是一家制造盔甲的小作坊,后来经过数代工厂主的苦心经营,造就了今日的景象。它最大的成功秘诀是,既不搞家族世袭制,也不搞职业经理人制度,而是采取选贤任能制度。每一代安德谢夫都从社会底层寻找一个饱尝生活艰辛的私生子,悉心培养,最终让他继承家业。安德谢夫们看中的并不是这个人的私生子身份,他想要的是这个社会弃儿屡经磨难而养成的那种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这样一来,每一代安德谢夫都能保留创业者身上才有的拼搏精神,上升时期的大工业家特有的那种力争上游、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然而,与历代安德谢夫不同的是,库森斯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只是由于法律界定的不同,才算作私生子,他徒具私生子的名义。事实上,他的成长和教育经历也完全是中产阶级式的,他并没有像真正的私生子——历代安德谢夫——那样经过艰苦的社会磨炼。按照他的自述,他在评教授的过程中,也干过不光彩的事情,从他和安德谢夫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他精于算计的一面,但是,这点心机和狡诈与安德谢夫所需要的“狼性”精神相比,还是相差甚远,另外,从剧中也可以看出,与芭巴拉一样,他对救世军和社会本质的认识程度,还不如泼赖斯这样的流氓无产者,就此而言,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由此可见,萧伯纳在描写安德谢夫所向披靡的同时,还有意或无意地写出了他后继无人的尴尬困境,这也是曾经勇往直前、睥睨一切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19世纪后半叶所处的历史境遇的真实写照,它真实地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在鼎盛时期过后工业精神日渐衰退的历史趋势。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马丁·维纳在文化史杰作《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中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探讨,在他看来,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之所以在19世纪中期之后渐趋没落,与这一时期开始兴起的反工业主义文化息息相关^[12]。具体地说,在1850年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之后,英国社会反对工业的声音逐渐出现了一边倒的态势,压倒了对工业的赞美之声;敌视工业生产,反对商业逐利,美化乡村绅士,丑化资产阶级,推崇传统价值,此类思想观念左右了公共舆论,渐次成为各阶层的共识,从而扼杀了崇尚竞争、重利轻义、热衷发明、注重效率的工业主义精神。这种异常保守的文化氛围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从政界领袖到学界人物,从舆论界的笔杆子到民间的古建筑保护者,无不受其影响,流风所及,致使工商业人才失血、企业竞争力下降、工业资本家后继无人,让英国工业在20世纪之后逐渐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虽然维纳在书中没有提到萧伯纳的这部剧作,但他却为我们理解安德谢夫的无奈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社会背景和异常新颖的文化解释,进而帮助我们看清文本中暗含的巨大矛盾:貌似取得最终胜利的安德谢夫实际上是一个失败者,他找不到像历代安德谢夫一样精明能干的继承人,当然,他没有意识到、当然也无法扭转英国工业资本主义衰落的必然趋势。

四、结 语

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曾指出,与以往相比,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 D. H. 劳伦斯之外,还没有哪一位本土出生的小说家能够像19世纪的查尔斯·狄更斯、乔治·爱略特等现实主义大家那样,具有博大的胸怀和气魄,从总体上去审视英国社会^{[13]10}。在20世纪初,英国小说的两个主要流派有一个通病:思想格局狭隘,社会眼光短浅。以 E. M. 福斯特、弗吉尼亚·沃尔夫、伊芙琳·沃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小说家囿于精英文化的视野,其思想旨趣在于伦理学、美学和形而上学,远离现实生活中具体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制度;萧伯纳、贝内特、乔治·威尔斯和奥威尔等人的下层阶级小说,深受到左拉的影响,自然主义气息浓厚,纠缠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细节,缺少宏观的思想视野,无法呈现英国社会的整体风貌^{[13]12-14}。伊格尔顿的这个判断基本上符合英国现代小说的总体特征,但他没有看到,20世纪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留下的缺憾,却在萧伯纳的这部戏剧中得到了弥补。通过描写安德谢夫家族的兴衰,萧伯纳具体而微地完成了他对英国现代历史和工业社会的总体透视,显示出贵族阶级日渐没落的历史趋势、贵族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历史联盟、工业资产阶级的不可一世及它不可避免的衰落命运。如此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内容,本来只有鸿篇巨制中才能得以充分予以展现,结果,它们却具体而微地体现在场景屈指可数、人物极其有限的三幕戏剧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

参考文献:

- [1] 马修·阿诺德.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 修订版. 韩敏中,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2.
- [2] MICHAEL H. Introduction[M]// GEORGE B S. Pygmalion and Major Barbara. New York: Bantam Dell, 1992: vii.
- [3] ERIC R B.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havian Drama[M]// ADAMS E B. Critical Essays on George Bernard Shaw.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50.
- [4] ELDON C H. George Bernard Shaw[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78.
- [5] ALICK W. A Good Man Fallen among Fabians[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0.
- [6] BARBARA B W. Sainthood for Millionaires[M]// HAROLD B. George Bernard Shaw's Major Barbara.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8.
- [7] 萧伯纳. 芭巴拉少校[M]. 英若诚,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 [8] RALPH F. The Colonial Policy of British Imperialis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8.
- [9] PERCEY S. Shaw's Own Problem Plays[M]// HAROLD B. George Bernard Shaw's Major Barbara.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8.
- [10] WILLIAM G M. Shaw's Comedy and Major Barbara[M]// HAROLD B. George Bernard Shaw's Major Barbara. New York: Chelseas House Publishers, 1988.
- [11] 爱德华·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6: 5.
- [12] 马丁·威纳.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 1850—1980[M]. 王章辉,吴必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
- [13] TERRY E. Exile and Emigrés; Studies in Modern Literature[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0.



(责任编辑 杨文欢)